



*A Study of
Life Philosophy in
Modern China*

中国近现代 人生哲学研究

程林辉 / 著



人民出版社



*A Study of
Life Philosophy in
Modern China*

中国近现代 人生哲学研究

程林辉 / 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方国根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近现代人生哲学研究/程林辉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6
ISBN 978-7-01-018784-6

I. ①中… II. ①程… III. ①人生哲学-研究-中国 IV. ①B8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00713 号

中国近现代人生哲学研究

ZHONGGUO JINXIANDAI RENSHENG ZHEXUE YANJIU

程林辉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2018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7.5

字数:280 千字

ISBN 978-7-01-018784-6 定价:4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目 录

上编 中国近代人生哲学

第一章 中国近代人生哲学概述	3
第一节 中国近代人生哲学的历史文化背景	4
第二节 中国近代人生哲学的发展历程	8
第三节 中国近代人生哲学的基本特征	17
第二章 龚自珍的人生哲学	22
第一节 “堂堂剑气冲斗牛”	22
第二节 “侧身天地本孤绝”	28
第三节 “双负箫心与剑名”	31
第三章 曾国藩的人生哲学	36
第一节 内圣外王,尽忠报国	37
第二节 打脱牙齿和血吞	41
第三节 不忤不求,戒骄戒佚	45
第四节 顺其自然,惩忿节欲	50
第四章 康有为的人生哲学	53
第一节 变法斗士,保皇领袖	54
第二节 去苦求乐,人之性也	59
第三节 大同社会,人生乐园	64
第四节 言行不一,矛盾人生	67
第五章 孙中山的人生哲学	71
第一节 行易知难,努力奋进	71

第二节 天下为公,互助服务	76
第三节 孙中山人生哲学的现代价值	84
第六章 梁启超的人生哲学	87
第一节 舆论骄子,启蒙大师	87
第二节 屡变善变,多面人生	94
第三节 趣味生活,情感动力	98
第四节 职业神圣,责任永恒	102
第七章 王国维的人生哲学	107
第一节 生活的本质就是痛苦	107
第二节 “一事能狂便少年”	112
第三节 “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115
第四节 “失行孤雁逆风飞”	120

下编 中国现代人生哲学

第八章 中国现代人生哲学概述	127
第一节 中国现代人生哲学的历史文化背景	127
第二节 “科玄论战”及其影响	131
第三节 中国现代人生哲学的繁荣	137
第四节 毛泽东人生哲学的诞生	141
第九章 蔡元培的人生哲学	146
第一节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146
第二节 人生在世,义务为先	152
第三节 无所不容,有所不为	155
第四节 安贫乐道,清正廉洁	160
第十章 陈独秀的人生哲学	163
第一节 “一身为人类之桥”	163
第二节 “青年如初春朝日”	167
第三节 “沧溟何辽阔,龙性岂易驯”	172

第四节 “身处艰难气若虹”	177
第十一章 鲁迅的人生哲学	182
第一节 “我以我血荐轩辕”	182
第二节 “吃的是草,挤的是奶”	188
第三节 “反抗绝望,向往新生”	191
第四节 珍惜生命,直面死亡	196
第十二章 胡适的人生哲学	199
第一节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199
第二节 “为全种万世而生活”	203
第三节 “有为总比无为好”	207
第四节 “我的朋友胡适之”	211
第十三章 梁漱溟的人生哲学	215
第一节 由佛入儒,儒佛人生	215
第二节 生命为本,生活为用	221
第三节 自强不息,乐天知命	227
第四节 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	231
第十四章 毛泽东的人生哲学	236
第一节 救国救民,改造社会	236
第二节 “与天奋斗,其乐无穷”	242
第三节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246
第四节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251
第五节 “愚公移山”	255
主要参考书目	259
索 引	263

上 编

中国近代人生哲学

第一章 中国近代人生哲学概述

中国近代人生哲学(1840—1919年)在中国人生哲学史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它是联结传统人生哲学与现代人生哲学的枢纽。社会性质的急剧变化、中西文化的冲突碰撞、不同流派的学术争鸣、多元选择的人生模式,使近代人生哲学形成自己的时代特征和内容风格。

鸦片战争爆发,西方列强侵略中国,中国从独立的封建国家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是近代人生哲学产生的历史背景。西学东渐,中西文化相互碰撞交流,先进的知识分子有选择地接受西方文化,这是近代人生哲学产生的文化背景。上述历史文化背景,使启蒙维新、救亡图存成为近代人生哲学的主旋律。

近代人生哲学经历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的萌芽期、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的形成期、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的转型期三个阶段。主要流派有龚自珍为代表的经世派人生哲学、曾国藩为代表的洋务派人生哲学、康有为和梁启超为代表的启蒙派人生哲学、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人生哲学、王国维为代表的学理派人生哲学。

近代人生哲学在引进西方人生哲学、批判改造传统人生哲学、推动近代思想启蒙、加速社会变革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和功利倾向。然而急剧变化的社会环境,迫在眉睫的民族危机,使近代人生哲学无暇进行自身的学术构建,缺乏深入的理论思考和学术积淀。特别是转型过于仓促,导致人们在纷至沓来的社会思潮和多元选择的人生模式面前感到困惑迷惘、无所适从。

第一节 中国近代人生哲学的历史文化背景

一、中国近代人生哲学的历史背景

18 世纪末,西方主要国家先后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国力迅速强大。为了获取更大利益,西方资本主义开始把侵略的魔爪伸向中国。1840 年,英国殖民者用炮舰轰开中国的大门,强迫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鸦片战争使中国社会性质发生了巨大变化,由独立的封建国家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鸦片战争后,西方殖民者对中国进行疯狂侵略掠夺。1856 年,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强迫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从 1858 年到 1864 年,俄国逼迫清政府签订《璦琿条约》、《北京条约》、《勘分西北界约记》三个不平等条约,霸占中国领土 150 万平方公里。1894 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支付战争赔款 2 亿 3 千万两白银。1900 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强迫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通过上述战争和不平等条约,西方列强不仅侵占中国的大量土地,而且取得了一系列政治经济特权,如设立租界、开发矿山、修筑铁路、驻扎军队、领事裁判权等等。中国的国家主权、领土完整遭到严重破坏,面临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

西方列强的侵略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两大变化:一是西方商品和资本的大量输入,破坏了自给自足的中国经济,推动了商品经济和民族工业的发展,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条件,从而动摇了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促进了封建社会的解体,把一个封建的中国逐渐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中国;二是西方列强的侵略,并不是要把中国变成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要把中国变成他们的商品倾销市场和原料产地,也就是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一个半殖民地的中国。

在近代中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势力相互勾结,成为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两座大山。封建主义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社会基础,帝国主义则是封建主义的政治靠山,从而形成中国近代社会的两大主要矛盾:帝国主义与中华民

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成为近代中国人民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为了实现这两大历史任务,中国人民掀起了不屈不挠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从林则徐的虎门销烟、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到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从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到辛亥革命,中国人民以血肉之躯捍卫民族独立,粉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美梦,迎来了现代曙光。

中国近代人生哲学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登上历史舞台的。社会性质的巨大变化,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使近代人生哲学与民族同呼吸、与时代共命运。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为救亡图存营造舆论氛围,致力于思想启蒙、政治维新、社会改造,是近代人生哲学的时代特征和主要任务。这一切,使近代人生哲学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

二、中国近代人生哲学的文化背景

西学东渐,西方殖民者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和文化渗透,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从拒斥到碰撞、再到有选择地接受,这是中国近代人生哲学产生的文化背景。在近代中西文化碰撞、交流、融合过程中,形成了经世思潮、洋务思潮、维新思潮和新文化运动四大文化思潮。

(一) 经世思潮

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惊醒了国人的“天朝”美梦,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面对西方殖民者的野蛮侵略,满清贵族的腐败无能,社会矛盾的尖锐复杂,萌生了浓厚的忧患意识,形成一股经世思潮。经世思潮的开风气者是龚自珍、魏源。龚自珍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封建专制主义和腐朽的社会现实。当绝大多数人还沉浸在河清海晏、歌舞升平中,龚自珍却指出清王朝已处于“衰世”状态,“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人思灯烛,惨惨目光,吸引暮气,与梦为邻”^①;他控诉罪恶的“文字狱”,“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②;他揭露科举制度陈陈相因,模仿抄袭,扼杀人们的创造性;他呼吁整顿吏治,打破论资排辈制度,实行能者上、庸者下,让年轻人才脱颖而出,“我劝

① 王佩诤校:《龚自珍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87页。

② 王佩诤校:《龚自珍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471页。

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①。

魏源是中国近代对鸦片战争进行反思的第一人。他认为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原因是“技不如人”,中国的大刀长矛抵抗不了西方的坚船利炮。要抵抗外国侵略,必须“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师夷之长技”首先是“悉夷情”,了解和熟悉西方的历史沿革、民情风俗、社会制度、科技发展等等。具体途径是成立译馆,培养西语人才,翻译西方书籍。“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欲悉夷情者必先立译馆,翻夷书。”^②其次是了解“夷之长技”,即西方有哪些长处。只有了解西方的长处,才知道向西方学习什么。魏源认为“夷之长技”有三:战舰,火器,养兵练兵之法。再次“师夷之长技”的目的是“制夷”,即抵抗西方侵略,维护民族独立。

(二) 洋务思潮

从19世纪60年代到甲午战争爆发,近代中国掀起了一股洋务思潮,代表人物有曾国藩、李鸿章、冯桂芬、郑观应等。洋务思潮主张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创办军事民用工业,训练新式海军,目的是应对“千年未有之变局”,实现富国强兵。

洋务思潮中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是“中体西用”。最早阐述“中体西用”的是冯桂芬,他在《采西学议》中指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③郑观应则认为中学与西学的关系是一种本末关系:“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④正式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是孙家鼐,他在筹办京师大学堂的奏折中说:“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以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⑤所谓“中学”,就是中国固有的封建制度、纲常名教、传统文化;所谓“西学”,就是西方的科学技术、工艺文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在突出中学主导地位的前提下,承认西学的辅助作用,它体现了洋务派对中

① 王佩诤校:《龚自珍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521页。

② 陈华校注:《海国图志》,岳麓书社1898年版,第3页。

③ 张岱年主编:《中国启蒙思想文库·采西学议》,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4页。

④ 张岱年主编:《中国启蒙思想文库·盛世危言》,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页。

⑤ 孙家鼐:《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见《皇朝经世文新编》卷六,光绪辛丑上海书局石印本。

西文化的一种选择态度:中西兼容,以中为主。

(三) 维新思潮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后,西方列强掀起了一股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进一步沦为西方的殖民地。民族危机的加深,促进了民族意识的觉醒。一批具有爱国情操并接受西方思想的知识分子,慨然以天下为己任,投入到救亡图存的洪流中,形成了一股汹涌澎湃的维新思潮。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冲破洋务派“中体西用”的樊篱,开始学习研究西方的思想学说和政治制度,并将其引进国内,以寻求挽救民族危机的良方。维新派的工作重心放在鼓动变法、开启民智、铸造“民魂”等方面。康有为多次向光绪皇帝上书,请求变法。他说:“法既积久,弊必丛生,故无百年不变之法。”^①他劝告光绪皇帝弃旧图新,推行新政,“观大地诸国,皆以变法而强,守旧而亡,然则守旧开新之效,已断可睹矣。观万国之势,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②梁启超认为:救国的前提是“新民”,启发国人的思想觉悟,提高国民素质。“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③此外必须铸造“中国魂”,培养国民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今日所最要者,则制造中国魂是也……使人民以国家为已之国家,使国家成为人民之国家。”^④在严复看来,要维新必须学外国,了解西方学术文化。为此,他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等一系列西方学术著作。在《天演论》中,严复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阐述救亡图存思想,主张“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呼吁国人自强自立,追赶世界潮流。

(四) 新文化运动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为中西文化交流融合创造了条件。但辛亥革命并没有摧毁封建文化的根基,封建的思想文化不仅大行其道,而且严重束缚人们的思想,阻碍社会前进。严酷的现实告诉人们:如果没有一场深刻的思想启蒙,唤醒国人的文化自觉,要从根本上改造中国是不可能的。

-
- ① 舒芜选注:《康有为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52 页。
 - ② 舒芜选注:《康有为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52 页。
 - ③ 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 2 册,北京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957 页。
 - ④ 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 1 册,北京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57 页。

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是陈独秀、李大钊、胡适,这是一批具有新思想、提倡新文化的知识分子。他们以《新青年》为阵地,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以进化论和个性解放为武器,对封建的思想、文化、道德展开激烈批判,形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陈独秀指出,中国要摆脱愚昧落后状态,必须提倡科学和民主。“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①因为只有民主与科学,才能“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②。但封建礼教文化扼杀民主与科学,因此“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③。胡适对新文化运动的重要贡献是发起文学革命,主张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新文化运动对封建思想、道德、文化的勇猛冲击,是一场深刻的思想启蒙和个性解放运动,国人受到一次民主科学思想的洗礼,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近代人生哲学的现代转型。

第二节 中国近代人生哲学的发展历程

一、中国近代人生哲学的萌芽期

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爆发是中国近代人生哲学的萌芽期,主要流派有经世派人生哲学和洋务派人生哲学。

(一) 经世派人生哲学

经世派人生哲学产生于19世纪上半叶,代表人物有龚自珍、魏源。面对严重的内忧外患,以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敏锐地察觉时代变化,揭露社会黑暗,呼吁变法图强,提倡经济功利,主张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冲破封建束缚,形成了以经世致用为核心的人生哲学。

① 任建树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4页。

② 任建树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43页。

③ 任建树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42页。

首先,经世派人生哲学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和改革精神。龚自珍大胆揭露黑暗的社会现实:“自京师始,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贱,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日月,奚暇问年岁?”^①他警告封建统治者,如果让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势必官逼民反,危及清王朝的统治。“贫者日愈倾,富者日愈壅……小不相齐,渐至大不相齐,大不相齐,即至丧天下。”^②要改变被灭亡的命运,只有改革,“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③与龚自珍呼吁改革相配合,魏源则积极参与改革实践。在贺长龄、陶澍府中任幕僚时,魏源积极协助他们参与盐务、漕运和水利工程的改革,并取得一定成效。

其次,经世派人生哲学提倡经世致用的价值观。龚自珍信奉今文经学,讽刺汉学家们整天钻故纸堆、对各种名物进行烦琐的训诂考证,“纵使文章惊海内”,也不过“纸上苍生而已”^④。魏源追求功利实用,认为义利统一,即使圣人也不讳谈利,“足民、治赋皆圣门之事,农桑、树畜即孟子之言”^⑤。在编写《皇朝经世文编》时,魏源将“实用”和“时务”作为选编标准,所选文章偏重经济之策,涉及理财、赋税、盐务、漕运、河工、农桑等国计民生内容。更可贵的是,在面对西方殖民侵略、民族危机显露的情况下,魏源开始探寻中华民族的御侮自强之路,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方略。

再次,经世派人生哲学强调“尊心”、“尊我”,具有冲破封建束缚的思想解放作用。龚自珍十分重视“自我”和“心力”的作用。他说:“众人之宰,非道非极,自名曰我。”^⑥认为“我”在宇宙万物中处于“主宰”的地位。“我”之所以能主宰宇宙万物,根本原因在于天地万物、日月山川、人类自己都是“我”创造的。而“我”有如此巨大的力量,是因为“心力”的支撑。“心无力者,谓之庸人。报大仇,医大病,解大难,谋大事,学大道,皆以心之力。”^⑦龚自珍重视“自我”和“心力”作用,实际上是强调人的自我意识、主观意志的作用,充分发挥

① 王佩诤校:《龚自珍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06页。

② 王佩诤校:《龚自珍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78页。

③ 王佩诤校:《龚自珍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

④ 王佩诤校:《龚自珍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565页。

⑤ 《魏源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6页。

⑥ 王佩诤校:《龚自珍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页。

⑦ 王佩诤校:《龚自珍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页。

人的主观能动性,同时在客观上具有冲破封建思想束缚、鼓吹个性解放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经世派人生哲学具有近代人生哲学的因素。

(二) 洋务派人生哲学

洋务派人生哲学活跃于19世纪的60—80年代,代表人物有曾国藩、张之洞。洋务派骨子里流动的是中国传统文化血液,信奉的是儒家人生哲学,因此对中西方文化采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态度。但毕竟处于中西文化碰撞交融的时代,经常与西方文化打交道,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人生哲学的影响。

第一,洋务派人生哲学在本质上属于儒家人生哲学。洋务派代表人物皆自幼饱读儒家诗书,具有扎实的儒学基础,他们都把内圣外王、成圣成贤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把维护封建制度、纲常名教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信奉的是儒家人生哲学。曾国藩从小就立志成圣成贤、为国尽忠。在他看来:一个人如果“不为圣贤,便为禽兽”^①。他继承了孟子“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观点,认为圣贤不是高不可攀的。“凡将相无种,圣贤豪杰亦无种。只要人肯立志,都可以做得到的。”^②一个人如果“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做到“慎独、主敬、求仁、习劳”,是可以成为圣贤的。在成圣成贤的道路上,曾国藩坚持“内圣”与“外王”并重,既性命双修,精研儒家义理,注重道德修养,成为一代理学名家;又经邦济世,建功立业,特别是在太平天国起义后,他临危受命,组织湘军,与太平军血战数年,最终剿灭太平军,成为“中兴第一功臣”。

第二,洋务派人生哲学崇尚务实精神、坚韧意志和刚毅品格。洋务派之所以能脱颖而出,与他们的务实精神是分不开的。曾国藩一生为人低调,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少说多做,躬行实践。曾国藩认为:一个男子汉要立身处世,成就一番事业,必须有倔强刚毅之气,“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③,只有倔强刚毅,才能不断进步。在与太平军作战中,曾国藩之所以能屡仆屡起,转败为胜,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倔强刚毅,打脱牙齿和血吞,能够坚持到底。

第三,洋务派人生哲学坚守“中体西用”的价值观。从表面上看,“中体西用”是人们对中西文化的不同态度,实际上却体现了洋务派对中国封建制度

① 《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112页。

② 《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1067页。

③ 《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1139页。

和纲常名教价值的肯定。与顽固派全面拒斥西方文化不同,洋务派赞成有限度地引进西方文化,即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制造工艺可以引进,但对动摇封建统治根基的西方议会制度、民权思想则坚决拒斥。在张之洞看来,封建制度、纲常名教属于“本”,关乎世道人心,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工商贸易、学校教育属于“通”,能够变化社会风气,可以灵活变通。在处理中学与西学的关系时,张之洞提出“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①。张之洞虽主张会通中西、权衡新旧、兼顾中学与西学,但他强调中学的主体地位,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

综上所述,经世派与洋务派人生哲学深深打上儒家人生哲学的烙印,是儒家人生哲学在近代的延续,无论是人生观、价值观、行为方式、处世态度都具有浓厚的封建士大夫痕迹。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几千年形成的封建社会、封建制度、传统文化具有较强的抗击外来文化能力,甚至能在一定程度上消解同化外来文化。但毕竟社会性质发生了变化,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军事、政治、经济侵略,西方文化逐渐渗透到国人中,对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行为习惯产生一定的影响。经世派对黑暗现实的批判、社会改革的呼唤、经世致用的提倡、情感个性的尊崇;洋务派对西方生产方式、工业文明、科学技术的引进,客观上具有近代资产阶级的性质。上述因素势必影响到人生哲学,使经世派与洋务派人生哲学染上某些近代色彩,它标志着中国近代人生哲学进入了萌芽期。

二、中国近代人生哲学的形成期

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人生哲学的形成期,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为代表的启蒙派人生哲学为标志。启蒙派人生哲学大胆冲决封建专制和纲常名教的束缚,广泛宣传西方思想文化,对国民进行思想启蒙;深刻揭露民族危机,积极鼓动并参与维新变法;用西方人生理论改造中国传统人生哲学,提出了很多带有资产阶级色彩的人生哲学思想。

首先,启蒙派人生哲学积极传播西方思想文化,对国民进行思想启蒙,把人们从封建思想文化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为近代人生哲学的形成奠定了思想

^① 张之洞:《劝学篇·会通》,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96页。